

石民和青冰(上)

——抗战流亡中陨落的邵阳文学双星

陈扬桂

有这样两位邵阳籍文学家,其辉煌的文学成就,曾经照亮过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方星空。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流亡奔波,劳顿不堪,他们贫病交加,过早陨落,成了两颗流星,其璀璨的光芒稍纵即逝,以至于长时间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一个是诗人石民,一个是作家青冰。

石民:著名的象征派诗人

作为诗人,石民属于象征诗派。在象征派诗人中,他与该诗派创始人李金发和“雨巷诗人”戴望舒齐名。

正如绝大多数邵阳人不知道石民一样,10多年前,笔者也对他十分生疏。后来,因为阅读《鲁迅全集》,发现在鲁迅笔下屡屡现身的“石民”,竟然是一位邵阳老乡。出于好奇,穷究深探,终于弄清石民是邵阳市新邵县人氏,他的坟墓就隐藏在新邵陈家坊的一丘山阿上。

石民原名石光络,册名噪,字阴清,号影清,1903年清明期间出生于陈家坊田里村。他的父亲石赞钧是光绪年间举人,任职于四川铜元局,母亲系当地杨姓举人之千金,知书识字,是石民兄弟三人的启蒙老师。

石民自幼聪明好学,仪表英俊,既是才子又是帅哥。1924年,他从长沙岳麓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当时英语系教授林语堂、叶公超、陈西滢、温源宁、徐志摩,以及同学胡风、废名、梁遇春、游国恩、冯至等人,都是当时或者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作家。受师友们的影

响,石民在学生时期就热爱文学,最爱读诗歌和外国的随笔散文,并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和研究。对诗歌,他“不喜欢流利之艳体”,而最爱“含有极多思想的悱怨之作”。1930年前后,他在文坛特别活跃,不少诗歌、翻译、散文作品发表在《语丝》《骆驼草》《文学杂志》《北新》《现代学生》等报刊上。他与鲁迅等大文豪一样成了《语丝》的重要作者,与废名、梁遇春成为《骆驼草》的主要作者,并称为“骆驼草三子”。

石民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潇洒英俊、风度翩翩,天生一副诗人气质。他的文友温源宁曾对废名和梁遇春说:“石民漂亮得很,生得像天使!”梁遇春也说石民具有“彻底的青春”。还在北大读书时候,石民就写过一首题为《无题》的诗,将死亡与短暂的爱情作对比,表达了死亡的永恒的主题。就是这首诗,使他得以在象征诗派中崭露头角。随着他的创作成果不断增大,逐步可以与象征派代表戴望舒、李金发相提并论了。

石民的诗和他同时代其他象征派诗人一样,透过“象征的森林”去揭示着某种人生的际遇和存在的境状。

石民是诗人,也是散文家、翻译家、编辑。1928年,他大学毕业,次年远赴上海,在北新书局任编辑,曾编辑过《北新月刊》《青年界》等。他重乡重情,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热心帮助从家乡逃亡到上海的进步青年唐麟(建国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补习英语,后来又相继介绍唐麟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作旁听生,跟好友废名学写作。



怎样采写经济报道

罗 础

经济报道是反映社会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新闻报道。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随着经济的开放搞活,人们对经济报道越来越感兴趣,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报道的品位是当今新闻工作研究探讨的重大课题,笔者结合新闻采访与写作实践谈些粗浅体会。

转变思维方式 适应市场经济

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同一定的时代息息相关、密切联系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革。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人们对经济报道的要求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从我们的报道内容看,过去往往孤立静止地看经济活动,把活的新闻写死了。从领导、部门和经济工作角度考虑的问题多,对各种会议、领导指示、上级有关文件报道的多,单纯报道具体的生产业务、工作经验的多,而从群众需要考虑的少,来自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第一线的鲜活新闻少。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它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紧地连在一起,任何一个新事物、新变化的出现,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读者对于这些事物的了解,已远远不满足于只知道“是什么”,而更关心“为什么”、“会怎样”,更需要了解事物发展的背景、发展过

程及各种可能的走向,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立体思维去认识和把握事物。我们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自主性,把经济报道从过去单纯的生产性报道转向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报道。针对市场经济的开放性,采写经济报道必须强调客观的公正性和开放度。只有这样,才能采写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广大读者需要的经济报道来。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又是一种活力经济。激烈的社会变革、活跃的社会竞争,使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作为新闻工作者,应该响应市场经济的呼唤,敢于触及市场经济的热点,善于捕捉“活鱼”,向读者提供新鲜活泼、有声有色的新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自主性、盈利性的经济,又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我们要从总体上把握它,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全局在胸,捕捉到那些影响全局、带动全局的重大题材,写出时空跨度大、有历史纵深感的报道。近年来,我们邵阳日报坚持每天由中级以上职称的采编人员轮流评论当日报纸;每周星期一上午召开各部室主任参加的周前会,部署一周的新闻报道工作;每周星期五下午报社组织全体人员集中学习新闻业务、政治理论,进行形势教育。通过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全体采编人员及时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更新思想观念,转变思维方式,把视眼、笔尖瞄准基层,瞄准生活,瞄准市场,瞄准广大读者普遍关心的难点、热点、疑点,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全方

位

石民与文学大师鲁迅交往十分密切,在1928年7月1931年这段时间的日记中,鲁迅有57处记载了他们两人的交往。当年石民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时,常常慕名到中文系来听鲁迅先生的讲座。石民到北新书局任编辑后,鲁迅的许多著作,特别是翻译作品,都是通过石民约稿和编辑,然后在北新书局出版的。1930年11月,石民得了肺病,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鲁迅先后5次陪同石民去在上海开诊所的日本医生平井博士家里就诊,并为石民当翻译。1934年5月,石民的肺病加重,急需筹钱治病。危难之际,他想到了乐于助人的鲁迅,请鲁迅帮他解难。鲁迅果然不负石民所望,借了250元银洋给他治病。

1932年11月,石民在南京与比他小两岁的堂表妹尹蕴纬结为伉俪。尹蕴纬是邵东县流光岭人,她的母亲石漱林早年在南昌创办正蒙女校,是石民的远房姑妈。尹蕴纬的二哥尹仲容曾任台湾经济部长,对复兴台湾经济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享有“台湾经济之父”的美誉。

1934年前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妹妹与石民的同事赵景深结了婚,而石民身体又越来越差,李小峰开始重用赵景深。石民便辞了北新的编辑职务,在武汉大学学术权威、他的连襟席鲁迅的引荐下,来到武汉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石民随同学校一起流亡到四川乐山。由于长途跋涉,疲于奔命,又兼忧国忧身,心情沉痛,石民病情越发严重了,自己又没钱看病,只向学校告假,回到陈家坊老家,请草药郎中弄些草药吃。但终因医治无效,于1942年初撒手人世。

石民虽然只活了不到40岁,其从事文学的历程更短,却留下了各种著作近20部,单篇译作、散文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诗集《良夜与噩梦》,译作《曼依》《巴黎之烦恼》《德伯家的苔丝》《忧郁的裴德》《他人的酒杯》,其中《巴黎之烦恼》是翻译到中国的第一本波德莱尔散文诗。石民还编著了《古诗选》《北新英语文法》等多种教材,特别是《北新英语文法》发行量很大,为当时中学通用教材。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享誉天下,近人恐怕无人不知。但他出道之前,并不被人看好。英国的著名记者戈登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是这样描述的: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他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在戈登眼里,曾国藩就是一个平庸无奇笨头笨脑的家伙。与戈登持相同看法的还有清代的著名学者方宗诚,他看曾国藩就像一个刻板固执毫无作为的“老教师”。这些人的看法差一点就影响了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任用。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糟老头子”,建立湘军,摧毁了太平天国,力挽清王朝于即倒。在他的建议下,中国建造了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工兵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最后封武英殿大学士、一等勇毅侯。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评价他的这位老乡: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可见,曾国藩也曾是被人看走眼的。

这样的情况外国也有。日本有个明石元二郎。他在进入日本陆军幼年学校时,因为样子长得呆头呆脑,同学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木瓜”。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在主管士官学校时就断言,明石“将来能指挥一个中队就不错了”。但是,后来明石对国家卓越贡献,证明山县有些看走了眼。

1902年明石元二郎作为驻俄国使馆副武官来到圣彼得堡。那时日本举国上下都把沙皇俄国当成备战对象,但是,当时沙俄有120万军队,日本却只有30万兵力,而且还要跨海与俄军作战,要想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时的明石想,如果能联合沙俄内部的反对势力,以增加沙俄的内耗,那么日本对俄国的战争就有很大的胜算。于是他就在斯德哥尔摩的高级赌场,利用自己掌握的高等数学知识赢得了大把大把的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从德国军火商那里买来了大批左轮手枪、步枪和炸药,并设法交到沙俄内部的反对派手上。1905年4月,明石通过沙俄反对党领袖齐利阿库斯邀请俄国19个反对党在巴黎开会,连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参加了,甚至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都亲自到场。尽管列宁在会上看到了日本间谍的身影而很快离场,但是,在明石挑唆下的俄国各地的暴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沙皇只好被迫与日本媾和。一场本应俄国大获全胜的战争,在一个能“指挥一个中队就不错了”的日本人的操作下,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日俄战争结束,明石元二郎奉命回国,随后被晋升为上将。日本人对他的评论是:“没有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绝对赢不了日俄战争。”

以上是卓越智者被错看成是“无能之辈”的情况,当然,历史上也有“稀牛粪”被看成“香饽饽”的例子。

曾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1070年被宋神宗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一上任就颁布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以及有利于巩固农村秩序的保甲法、连坐法等,这些“法”的实施,促进了北宋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壮大,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年纪大了,该退休了,但他希望他的改革能够继续推行下去。有一天,他和人谈论继承人的时候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板着手指头算,认为只有蔡京、吕惠卿以及他的二子王元泽等三人而已。果然,1101年宋徽宗即位后,立即任命蔡京为宰相,要他继续推行王安石的“新法”。结果,蔡京上任后,一反王安石的“以人为本”的改革思路,而是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等耗资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币制混乱,民怨沸腾。时人称之为“六贼之首”。蔡京的腐朽侈靡和王安石的俭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堂堂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在用人的问题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怎样采写好新闻(91)